

中欧关系研究简报

第三期

2012年6月26日

清华大学（IIR）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主编：张利华

编辑：王亮

目 录

【中心快讯】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代表访问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3)

【出国学习】

2012 年赴巴黎政治学院和里尔政治学院交换生项目落实…………… (3)

【研究成果】

史志钦：英国自由党兴衰借鉴…………… (4)

史志钦：西欧政党竞争呈现新特征…………… (6)

张利华：英、法、德精英人士看中国崛起及我国对欧洲公共外交建议…… (11)

【学术园地】

“法国大选及奥朗德政府的政策调整”学术研讨会…………… (16)

“文化价值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25)

“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 (39)

[中心快讯]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代表访问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0日上午10点半，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郑燕康教授，主任史志钦教授、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与来访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处副处长、孔子学院院长曹雪飞女士在明斋315室进行了座谈。

会上，理事会主席郑燕康教授对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在发展与欧洲国家高校的校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和支持。曹雪飞院长作为格罗宁根大学的校方代表，介绍了格罗宁根大学与中国高校合作的经验，表示十分愿意与我中心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双方确定了交换生项目，下学期在我系继续开设《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特邀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Jan Van der Harst教授和Frank Gaenssmantel博士来讲课。

经商议确定，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合作项目将于今年10月20日举办有关“中欧关系”的学术研讨会，特邀欧盟驻华使团代表、荷兰驻华使团代表，格罗宁根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里尔政治学院的专家教授与中国文化部、外交部以及中国高校的专家发言和讨论。

(撰稿人：袁帅)

[出国学习]

2012年赴巴黎政治学院和里尔政治学院交换生项目落实

由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负责的2012年巴黎政治学院、里尔政治学院交换生项目已经落实。2012年9月，12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将赴巴黎政治学院交换学习一学期，3名学生将赴里尔政治学院交换学习一学期。

今年秋季学期，巴黎政治学院将派送8名学生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国际关系学系和历史系交换学习。

[研究成果]

英国自由党兴衰借鉴

《人民论坛》2012年第4期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提要】英国自由党是英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为古老悠久的现代政党之一。自由党衰退沉浮的历史证明，在英国两大政党制度的格局下，中间立场是站不住的。

英国自由党是英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为古老悠久的现代政党之一。自由党及其前身辉格党诞生于17世纪，辉煌于19世纪中期，衰落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19世纪之后一百多年的兴衰与沉浮中，它曾与另一古老政党保守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构成英国经典般的两党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党的地位逐渐被工党所取代，成为英国的第三党，期间也会偶尔与两党之一构成联合政府，但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2010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由自由党演变而来的自由民主党作为英国政党的第三支力量崛起并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因而再度引起人们对于自由党的沉浮兴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何培育群众基础

二十世纪之初，英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突出，曾为自由党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为争取业已获得选举权的广大群众手中的选票，自由党巧妙地利用它与工人代表委员会在诸多问题上的共识，与其建立合作关系。而工人代表委员会也在立足未稳之际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自由党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凭借着工党的支持，自由党在1906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获得下院的绝对多数而再次上台执政。但这种外表的强大却掩盖不了它内部的弱点。

实际上，在20世纪头10年中，自由党各社会阶级的支持者都在慢慢地脱离自由党。其原因首先是自由党的核心支持群体——商人在迅速减少。20世纪初，自由党的商人支持者为自由党的政策越来越不满，他们开始慢慢地退出政治生活。1892—1895年商人在自由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为43—44%，1906年下降到33—34%。其次是以工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组织越来越把工党作为自己政治成功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于自由党的政策，导致自由党自然也失去如此庞大的选民支持队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受一战时参政锻炼因而信心倍增的工党，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更新和组织改造，这时的工党已不再满足于追随自由党的政策。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工党在自己纲领的旗帜下一举提出360名候选

人，同比 1910 年选举，工党只推选了 78 名候选人。工党的一系列决定造成自由党失去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为随后工党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 1922 年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以绝对多数票重新上台。与此同时，工党议席猛增一倍，第一次超过了自由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历史性地结束了保守党和自由党控制议会中绝对多数的两党制的格局。

如何避免内斗

自由党内部结构和派别斗争是其衰落的重要组织原因。自由党从一成立起就一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由于其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英国政坛上希望改革的力量都聚集于党内，结果导致自由党内存在许多派别，领导集团左右为难，在许多问题上只能采取小心翼翼甚至见风使舵的方针。自由党的存在高度依赖于各派人士对党的忠诚，党的活动依赖有声望的政党首脑，党的督导员与注册委员会经常脱节。一旦党内派别利益与自由党主流发生冲突，往往容易留下分裂的隐患，使它难以经受严重的政治风暴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执政的自由党被迫组成联合政府。1916 年自由党在英国如何参战的问题上发生大分裂，分裂为阿斯奎斯派和劳合·乔治派，两者之间的斗争使本党受到致命打击。在 1918 年 12 月的选举中，党内两派各自为战。在大战中赢得一定声誉的劳合·乔治勉强联合党内另一派别与保守党结成竞选联盟，艰难地赢得了选举胜利，在保守党的支持下继续组阁为政，但在此次议会的 707 个议席中，自由党仅占 136 席。选举结果证明，衰落的自由党已不能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发挥多大作用了。随着战后“相对繁荣”期的结束，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又进一步导致劳合·乔治政府陷入困境之中。这时，卧薪尝胆的保守党乘势而上，决定抛弃劳合·乔治，依靠保护主义来重振经济。

如何适应时代潮流

自由党及其前身辉格党是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政治不平等起家的，但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已基本实现。如前所述，随着议会选举改革的成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拥有了自己的议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摆脱自由党为核心的独立劳工运动及其政党组织。这样，过去一向只有自由党充当工人阶级代言人和社会改革倡导者的局面必然要受到挑战，致使自由党势必会丧失一定的社会基础。随着工党的崛起和壮大，与其具有类似价值观的自由党的衰落势成必然，它夺走了自由党的选民，使自由党成为无本之木。

同样，从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来看，自由党长期主导的自由主义也受到挑战。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这些基本思想一直体现于英国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中，但是一战的爆发及随后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则使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遭到破坏。这一现象表明，自由主义及其代表者自由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随后自由党及其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自由党人行动上步调不一，难以有所建树。与此同时，针对英国社会出现的

社会贫困、经济衰退和失业现象，作为工党理论基础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则明显地成为时代的潮流。

自由民主党的革新与复兴

20世纪80年代，由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右翼经济政策，英国失业人数日益增多，反对党工党中的左派势力占据上风。而且，工党党内的温和派人士对工党当时排斥欧洲和北约的情绪也感到不满，逐渐形成了离心倾向。后来，这批工党成员另立门户，成立了一个新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士很快发现，该党许多政策都与自由党十分相似。出于大选争取选民的考虑，这两个党顺理成章地展开了政治上的合作。1988年，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新党取名为自由民主党，进而揭开了政党转型的崭新的一页。

自由党衰退沉浮的历史证明，在英国两大政党制度的格局下，中间立场是站不住的。然而，直到1999年之前自民党一直将自己定位于中间偏左的激进派，所以，自由党与自由民主党发展壮大的空间自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鉴于自民党与工党在政治倾向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1995年以来，它也逐渐同工党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1997年大选后，自民党与执政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在很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密切的合作。但是自民党和工党还是保持着自身的特色，自民党非常强调个人权利，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这是因为，自民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就是强调个人权利，反对过于强大的政府。但由于英国选举制度鼓励大党、惩罚小党的关系，尽管自民党得票率总是非常接近于两大政党，但却始终无法有效转换成为下院议席。自民党的这一政治地位，使之非常重视自身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

进入21世纪，随着自民党内部体制越来越亲民化、民主化，也随着它的政策越来越迎合英国选民的意愿，该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支持率不断攀升。自民党现任党魁是尼克·克莱格。在2007年党魁选举中，他以50.6%的得票率，成为新任党魁至今。2010年英国大选成为自民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民党成为大选的赢家，成功地塑造了战后英国政坛上极为罕见的三足鼎立的政党政治格局。由自由党演变而来的自由民主党再次与保守党联合建立联合政府，但此届联合也决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

西欧政党竞争呈现新特征

《人民论坛》2012年第10期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提要】进入新世纪后，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方向感不断迷失。

进入新世纪后,整体看来,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方向感不断迷失,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边缘性政党的作用开始凸显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政党边界愈来愈模糊。如前所述,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都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的肆虐。所谓“历史的终结”甚嚣尘上。这时,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长达十几年与执政无缘。其他的社会党有些虽仍在执政也因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备受攻击。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左翼掀起了一阵改革旋风,其标志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党盛行的“第三条道路”,其代表人物和政党包括以托尼·布莱尔标榜的“新工党”,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总理里昂内尔·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施罗德以“新中间道路”著名,若斯潘则自称“现代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传统的左翼政党向中间靠拢。由此,欧洲出现粉红色的天下,中左主导政坛,右翼处于混乱之中。

中左政党主导西欧政坛的局面持续大约十年左右,亦即从 1997 年到 2007 年,从布莱尔复兴工党主政至 2007 年 5 月 10 日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世纪之交之际,右翼一批新生代领导人崭露头角,如英国的卡梅伦、法国萨科齐、德国的默克尔等。他们为打破困境,力图革新,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劳工市场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也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右翼这些改革的实质也是向中间靠拢,由此,左右两类政党进一步趋同。

中左和中右势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犬牙交错之势,但总体趋势是以中右翼政党稍占上风。

以 2002 年法国大选为起点到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各国的新一轮政党轮替开始,中左和中右势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犬牙交错之势,但总体趋势是以中右翼政党稍占上风。其标志是,2002 年希拉克蝉联法国总统,社会党人若斯潘败北,反而输给了极右翼的候选人勒庞。此后,西欧几个大国及具有左翼传统国家的政党逐步让位于右翼政党。2005 年,德国提前大选,因力主改革的施罗德在选举中以微弱少数落后于崭露头角的德国铁娘子安吉拉·默克尔,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联合政府。2006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结束长达 12 年的执政。2007 年 5 月,法国萨科齐击败社会党人罗亚尔当选总统,维持了右翼继续主导法国政坛的局面,法国社会党再次陷入混乱与分裂之中。2007 年布莱尔丑闻缠身,再加跟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声誉大跌不得不辞职,随后戈登·布朗接任后已回天无力,在 2010 年 5 月的选举中黯然下台。这期间,右翼最后取代左翼的国家还包括意大利、荷兰等国。尤其是 2009 年 6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是个分水岭,选举结果令很多人颇感意外,不仅英、法、德等大国的左翼候选人纷纷败下阵来,中间偏右的主流派候选人普遍胜出,而且少数极右的党派候选人则跨越“门坎”首次当选。欧洲政治右倾趋势加强。

值得人们反思的是,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背景下进行的,以往遇到经济危机时,左翼政党的候选人会较容易胜出,因为他们较多赞成运用政府资源增加社会需

求，刺激经济复苏，而选民渴求在经济上得到解脱的心态会促使他们支持左翼候选人。但结果恰恰相反。左翼屡遭挫败，致使人们质疑欧洲左翼的健康问题，为什么恶化的经济衰退并不能提高欧盟内的社会党人的支持率？毕竟，市场放纵的弊端暴露无遗，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度自负的企业巨头都在祈求国家的搭救。然而，选民们并没有竞相地去支持主流的中左政党。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最近的一个专栏悲叹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而且是一个“不公正”。

面对金融危机，左翼没有提出一套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

多年来，欧洲社会党人一直在警告：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会带来恶果；但是也只是批评而已，由于内部分歧严重，难以形成有效地应对之策。最为核心的是左翼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坚持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成为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准则；不仅意识形态束之高阁，而且政治家谈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就有点别扭。过去十多年来，欧洲社会党盛行“第三条道路”，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实质上是社会党的新自由主义趋势；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认为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要改革，管理资本主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产生效果的东西感兴趣”。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就是向中间靠拢。

《纽约时报》解释欧洲左翼的困境，是因为右翼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如果属实，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诸多迹象表明，社会民主党面临着身份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8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产生身份危机》一文指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陷入了存在危机。他们当政时（例如德国和英国），其政策不得人心，当他们处于在野党地位时，面临强硬的右翼势力，无计可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公众中也不受信任。

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联合更加常见

与左翼危机伴随的另一现象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网络信息革命不断深入两股潮流的冲击下，欧洲政党在最近的一系列选举中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联合更加常见，政党组建更加困难等现象。

首先，主流政党让位，小政党崛起。放眼整个欧洲，一些理应稳坐政府的主导政党在不断地出现支持上的碎片化。某些西欧政府的“天然”政党，在经历几十年轮流执政后惨遭冷遇。2011年，执政的爱尔兰共和党只获得14席，获得15.1%的选票。此次选举共和党惨败，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共和党是爱尔兰最老牌的政党，自1932年首次上台以来，过去79年中执政61年。共和党几乎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走向，并带领爱尔兰从一个欧洲穷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如今却惨遭选民的抛弃。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执政老党，曾

以北欧模式的创造者而著名，1930年代开始几乎是连续执政，但同样在2006年惨遭选民的抛弃！反之，在2011年的各国选举中，具有疑欧情绪的政党“真正的芬兰人党”成为芬兰的第三名；德国绿党在基督教民主党执政58年的一个州居于首位，其领军者曾担任过教师，将成为首位绿党州长。在荷兰，民粹主义者——新自由党也引得主流政党殷勤献媚。2010年9月，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首次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该党对外来移民持敌视态度。

其次，联合执政逐渐成为主流模式。联合执政一般常见于北欧斯堪地纳维亚国家，但回首近几年，在经常以两党主导的多党制国家中，政党联盟也逐渐增多。由于主流政党不能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只得联合小党以政党联盟形式组阁。例如德国和英国，世世代代由中左和中右轮流执政局面如今被名不见经传的小党所取代。2010年5月英国选举后，保守党联合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与生态主义的绿党组成红绿联盟，现在则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党组成联盟。联合执政一般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才有可能，但是目前英德两国的政党联盟皆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基本上是纯粹为了执政而联合。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也概莫如此。

其三，随着主流政党面临诸多困境，边缘性政党蠢蠢欲动，作用日益重要。在某些国家，原来的小党加入主流，经常发挥权力平衡者的作用。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其前身自由党在1950年代仅仅获得3%的选票，但却在2010年获得23%的选票，加入了保守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德国绿党在民调中不断攀升，可能会在下次大选中再次加入联邦政府。尤其是，2011年日本核事故出现后，绿党带头挑战德国的核政策，支持率大幅度攀升。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地区性政党发展迅速，时而会加入或者成为全国政府中的关键支持者，如意大利北方联盟，原是地方性组织，先后几次加入政府。

最引人眼球的是极右翼的崛起。仅2010年，就有几个国家的极右翼在选举中取得突破。6月，荷兰以反移民而出名的新自由党成为议会二院第三大党，其席位从原先的9席骤升至24席。9月，瑞典极右翼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突破4%的最低门槛，成功进入议会，获得20个议席。

在当今欧盟，共有27个极右翼政党已对其所在的18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挪威、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等国都不同程度出现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现象。这些极右翼政党甚至已经在欧洲议会组成了欧洲极右翼政党联盟，将对欧盟本身亦产生一定的冲击。

欧洲正隐约出现一种新政治：旧的忠诚已经消失，政治认同模糊，选民对熟悉政党的信任在减少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欧洲正隐约出现一种新政治。在这种新政治中，旧的忠诚已经消失，政治认同模糊，选民对熟悉政党的信任在减少。无论是在原欧盟15国，还是在欧盟新成员国，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任政党了。统计显示，原欧盟15国有76%的民众不信任政党，而新

欧盟国家有高达 82% 的民众不信任政党。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几十年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极大转型，传统上联系个人与政党的机构组织日益衰落。这既包括中右政党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基础的教堂的衰落，又包括左翼政党支持基础的工会的衰落。随着教徒及工会会员的萎缩，主流政党的党员自然在减少，党的资金愈加拮据。

政党的衰落也反映出西方社会阶级冲突的减弱。在战后的几十年发展中，西方的社会结构变化深刻，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他们比较灵活，没有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属于“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指某些人在实现自己的物质需求之后，追求有关生活质量方面的“更高层”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既可以是政治上的，要求主动的参与，又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深受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影响，西方选民越来越不愿与主流政党结盟，也不再作为社会阶级而结盟。

这样自然导致阶级的忠诚不复存在，因而选票成为一种消费选择，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忠诚。在没有政治和文化分歧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再加入任何政党。如巴黎政治学院的布鲁诺·考特雷斯所说，“人们不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忠诚一个政党，一家工会，甚至也不会一项工作一干二十年”；在政治上，“他们不喜欢让某个组织为他们代言了，他们要自己为自己代言”。海盗党创始人里克更直白地说，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党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由于有了互联网问政，所以“不用等着有人把法律读给你听，你可以自己站出来，挺胸抬头地自己撰写法律条文。”

在这些新政治现象的冲击下，传统的主流政党不仅支持率减少，而且还时刻面临分裂的威胁。在政党分裂方面，左翼的表现更为突出。几年前，欧洲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在争取中间选民同时却开罪了党内传统左翼，搞得社会党“左右不是人”，党所主张的减少福利制度改革，把大批原来基本群众推向激进左翼。这种情况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法国社会党内严重存在。在最近的系列选举中，左翼政党选票下降与其内部分裂有着密切关系。在今年 4 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如果左翼胜出，与其说是左翼的复兴倒不如说右翼总统萨科齐的执政无能和不得人心，执政眼看期满，但他根本没有兑现几年前竞选总统时对选民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在全球化及信息化不断深化及不断蔓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政党政治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各种危机，面对许多问题束手无策，即使有策也效果不佳，传统的主流政党在逐渐丧失自己的能力，日益多元化的选民也不再把传统主流政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方式在急剧地改变着欧洲的政治面貌。传统的欧洲政党政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

英、法、德精英人士看中国崛起及我国对欧洲公共外交建议

(摘录)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一、英、法、德精英人士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2005年至2011年, 英、法、德精英人士对中国崛起发表了不少看法,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一) 崛起的中国充满活力, 提供了机遇、挑战与合作

2005年, 英国学者 William Rees-Mogg 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 “我们都以为我们将继续生活在美国霸权的时代, 但实际上中国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很明显。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 但是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经济。……与经济上成熟相伴的是中国在政治上的日渐成熟, 这将是世纪的最好保证。”^①

英国学者 Chris Patten 在 2008 年 5 月 13 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好处。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个全球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中美两国对霸权的争夺也不一定会在 21 世纪出现。这是可以避免的。……西方应当与中国合作, 而不是作对。”^②

法国学者卡罗勒·沙特兰 2010 年 5 月在法刊《科学与未来》发表文章说, “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脚步决不会就此打住!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中国的活力在现今世界无人能比。”^③

以上学者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及其作用做了肯定性的评论。关于超级大国问题, 我们应当有冷静的认识。当今世界, 超级大国不仅有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即硬实力, 而且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即文化力量。

这些学者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认为与中国合作是无法回避的选择。这些积极的评价虽然在欧洲有一定的声音, 但是, 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①William Rees-Mogg, *This is the Chinese century*, Times, The (United Kingdom); 01/03/2005Section: Features, Comment, pg. 15.

^②Chris Patten, *Why are we afraid of big, bad China? There's no reason*, The Times (United Kingdom) 05/13/2008Section: Features, Comment, pg. 21.

^③卡罗勒·沙特兰: “中国科研活力世界无人能比”, 法国《科学与未来》2010年5月。转引自星岛环球网: http://news.stnn.cc/ed_china/201005/t20100507_1319924.html, 搜索日期 2011 年 12 月 26 日。

（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

德国政治与科学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塞巴斯蒂安·贝尔斯克 (Sebastian Bersick) 在 2006 年 5 月 21 日发表文章说, “中国的崛起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机遇, 但也使世界, 特别是西方国家感到困惑, 甚至恐惧。对欧洲来说, 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①

这位德国专家把中国视为欧洲的竞争对手, 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资源、市场等经济领域, 而且还涉及政治领域。他担心中国发展模式会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从而减弱欧洲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三）中国将主宰亚洲

中国强大后会不会主宰亚洲? 不少英法德精英人士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07 年 3 月法国期刊《研究》刊登一篇巴黎政治学院和索邦大学教授国际经济的克洛德·梅耶 (Claude Meyer) 的文章说, 如果中国今后能够一直保持其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其现有的外交活力、保持其现有的军事现代化力度的话, 那么, 在未来 25 年之内, 中国主宰亚洲, 将有可能不可避免。^②

（四）中国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威胁

英、法、德一些精英人士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悲观的估计和负面的看法, 他们把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

资源威胁论。法国知名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 2005 年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描述了法国极右翼人士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之后写道, “中国崛起将给西方世界带来麻烦……为了石油和水资源等, 中国将会使用武力确保自己的需求, 从而成为全球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③

“经济威胁论”。面对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 英、法、德一些人士发出了“中国经济威胁论”。2005 年 6 月 6 日约翰内斯·韦恩在德国《政治评论》发表文章“欧洲‘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在多种说法中, “三只无形的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第一只手”是人民币的低汇率是明显的倾销; “第二只手”是中国的超级廉价人工成本; “第三只手”

^① 一通: “针对中国的崛起, 开始新的战略协调”, 德国之声网站 2007 年 11 月 6 日,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877997,00.html> 搜索日期 2011 年 5 月 22 日(海外)。

^② 克洛德·梅耶(Claude Meyer), “未来 25 年之内, 中国主宰亚洲, 将有可能不可避免”, 法国期刊《研究》2007 年 3 月。转引自军事论坛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28048-1-1.html>, 搜索日期 2011 年 12 月 26 日。

^③ 【法】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 《当中国改变世界 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 第 55 页。

是中国可能“吃掉”世界，如果20年后中国经济如预期增长4倍，地球将无法负担这样的资源消费。^①

安全威胁论。德国《明镜周刊》2005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说，“美国霸权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以中国为先鋒的亚洲时代已经到来了。……欧洲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②

上述英、法、德精英人士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有以下特点：

第一，敏锐与务实。对于英、法、德等国的精英人士而言，观察和分析政治问题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非常敏感，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十分关注。他们对中国事务反应敏锐，其中一些人观察问题比较客观务实，分析问题比较到位，既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机会和机遇，又看到了挑战与竞争；既看到了中国与欧洲的竞争与冲突，又看到了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与互利；既看到了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又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总之，用“两分法”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比片面、绝对的单向度地看问题要客观务实一些。

第二，片面与自大。从一些英、法、德精英人士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来看，明显地体现了一种片面性。譬如，有些人用“零和游戏”的博弈论看待中国崛起，从而得出中国崛起必然威胁西方世界的结论。他们忽视了国家之间还有合作、互利、双赢、多赢的一面。

在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不少英、法、德精英人士存在着“欧洲中心论”和道德优越感，他们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最优，并将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中国不尊重民主，不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将对他们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威胁。这种“单向度思维”不承认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多样化，很难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改革。

另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和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决定论也在一些英、法、德精英人士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此推断，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挑战原有的霸权国家而争霸世界。中国也会像崛起的德国挑战英国那样挑战美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种看法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看问题简单而偏狭，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国情以及民族心理完全不了解。

当今世界，国家不仅是军事经济共同体，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综合共同体。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既受到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制约，也深受其政治意识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中国与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做比较，两者差异非常之大。近代德意志联邦是普

^①约翰内斯·韦恩：“欧洲‘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德国《政治评论》，2005年6月6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05年6月17日，青木编译。

^②德国《明镜周刊》2005年第7期，来源：SPIEGEL MAGAZINE，<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搜索日期2011年5月22日（海外）。

鲁士王国通过王朝战争打出来的，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德意志第二帝国继承了普鲁士好战的军国主义传统，加之容克资本主义的本性，德国崛起后与英国争霸，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德意志帝国奉行“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观念，其贪婪、残忍和好战性比德意志第二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先秦时期中国民间思想界就出现了和谐思想，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确立儒学为国学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兼收并蓄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倡导和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期农民起义和讨伐战争不断，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充斥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是，这种符合人性需求的和谐价值观一直生存于民间，融合于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并通过科举考试、私塾学堂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式深入人心，融化于国民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形成了国民的价值共识和民族心理。

中华传统文化和谐价值观至今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老百姓和领导人。这一点在新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面多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①，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21世纪初，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理想目标，对待邻国，则提出了“睦邻、富邻、善邻”的外交政策。这些对外战略、政策和理想目标的提出并不是心血来潮、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谐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融合决定了中国强大后不会像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那样称霸世界。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中国坚持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容纳百川，永不枯竭。我们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自己。一个善于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其生机和活力是无限的。”^②

二、中国对欧洲公共外交建议

“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

^① “韬光养晦”是指含蓄自己的光芒，不过分炫耀自己，注重自身修养，使自身周正、平衡地发展。

^② 李红旗、段吉勇：“温家宝哈佛演讲，提出广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新华网，2003年12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2/11/content_1224824.htm。搜索日期2011年12月26日。

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①

中国公共外交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很大的进展，对外广播、电视频道逐渐增加，在世界 10 多个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与许多国家开展“中国文化年”及大型展览、文艺演出活动。然而，我国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并且缺乏公共外交战略和经验，在对外交往中，许多中国官员不善于搞公关，在外国公众中造成难以打交道的印象。一些外事人员对别国民众的宗教礼仪和风俗习惯了解不够，缺乏有针对性地对外文化交流方式，有些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把一些不礼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带到社交场合，给中国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有鉴于此，笔者提出我国对欧洲国家公共外交的几点建议：

第一，正视欧洲主流价值观，汲取其先进成分。

欧洲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近代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各领风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封建王权和制度，而且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为世界各国民众广泛接受。尽管各个阶级和阶层对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认识不同，但是，这些符合生产力发展和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当汲取现代世界先进的价值观，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价值观相融合，建构新型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推动面向欧洲民众的文化交流活动，使中欧人民在密切交往中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第二，积极鼓励社会部门和民间组织开展与欧洲各国民众的交往与对话。

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缺少真正的了解，受到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交流不到位。中国政府应当支持社会部门和民间组织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与欧洲国家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交往，请对方来中国各地访问参观，与中国各界人士对话，使其了解中国文化和真实的情况。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或支持中国文化组织、教育科学组织、社会公益团体走向欧洲，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解，消除误解。

第三，大力支持本国媒体与欧洲各国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应当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对待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对于其批评性评论，只要不是恶意诽谤和造谣，都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媒体传播渠道向欧洲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先进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使欧洲人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思想精华；继续扩大我国对外国媒体的开放程度，允许外

^①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第 21 页、第 15-16 页。

国媒体比较自由地在中国各地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工作,邀请欧洲主流媒体的著名记者来中国参观考察。

总之,中国与欧洲国家既有文化差异,又有文化共识,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合作互利。中国政府应当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有容乃大”的精神对欧洲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出现矛盾、冲突和问题时,积极寻求政治对话,通过交往、沟通、协商,一起努力解决问题。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今天,日益强大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华文化和谐思想将对世界和平做出有益的贡献。

[学术园地]

“法国大选及奥朗德政府的政策调整”研讨会观点综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与清华大学中法中心、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分别于2011年12月15日,2012年5月14日和24日举办了有关2012年法国大选和奥朗德政府的政策调整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史志钦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以下嘉宾参与了主题研讨:巴黎政治学院鲍明言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任潘鸣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田德文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庆治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利华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崔洪建研究员和金玲副研究员。其中,巴黎政治学院鲍明言教授就法国大选做了主题演讲。本文将主题演讲和各位专家的讨论观点整理归纳如下。

一、法国大选概况

1、历史视角

法国大选历经半年之久,在今年5月6日尘埃落定,法国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当选成为法国历史上新一任总统。5月15日,奥朗德宣誓就任。

从历史的视角看法国大选,奥朗德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第7任总统,在他之前一共选举了6位共11届法国总统。从1958年-2012年的54年历史上,左派总统党政14年,是1981年-1995年的社会党密特朗总统;右派总统党政40年。因此从法国政治的左右分野来说,这次奥朗德当选也是第二次左派当选。

由于法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时间和期限不同,因此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左右共治时期,即总统所属党派和与议会多数党不相同的情况。分别是1986-1988

年的密特朗时期，1993-1995 年的密特朗时期和 1997-2002 年的希拉克时期，前后共计 9 年时间。

在萨科奇总统执政的五年中，萨科奇所属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基本上拥有议会多数席位，因此其政策具有延续性，政策也具有稳定性。不过在萨科奇执政五年中，左派在地方选举和大区选举中不断争夺地盘，有所斩获。2011 年法国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组成的左派联盟险胜人民运动联盟，夺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这也被认为是法国总统选举的风向标之一。

2、制度层面

法国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相比较于总统制国家，半总统制保留了议会制的外衣，实际上保证了总统拥有绝大部分权力。法国总统也是法国三军总司令；拥有最高行政权力，能够任命政府总理和内阁，能够颁布政府法令、任命公务员；法国总统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提议进行公民投票，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行使特别权力。因此，法国的总统实际上比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也被称为“超级总统”。

法国总统由选民直选产生，从 1962 年开始进行全民直选。半总统制度赋予了行政权更多的权力，使得议会和强势总统产生了冲突。在西方，法国是立法权和行政权最不平衡的国家。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需要合作进行决策。法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在努力调整这种不平衡。2000 年希拉克时期通过投票缩短了总统任期，由 7 年总统任期缩短至 5 年，这使得议会和总统任期达成了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左右共治容易造成的困局，实际上加强了法国总统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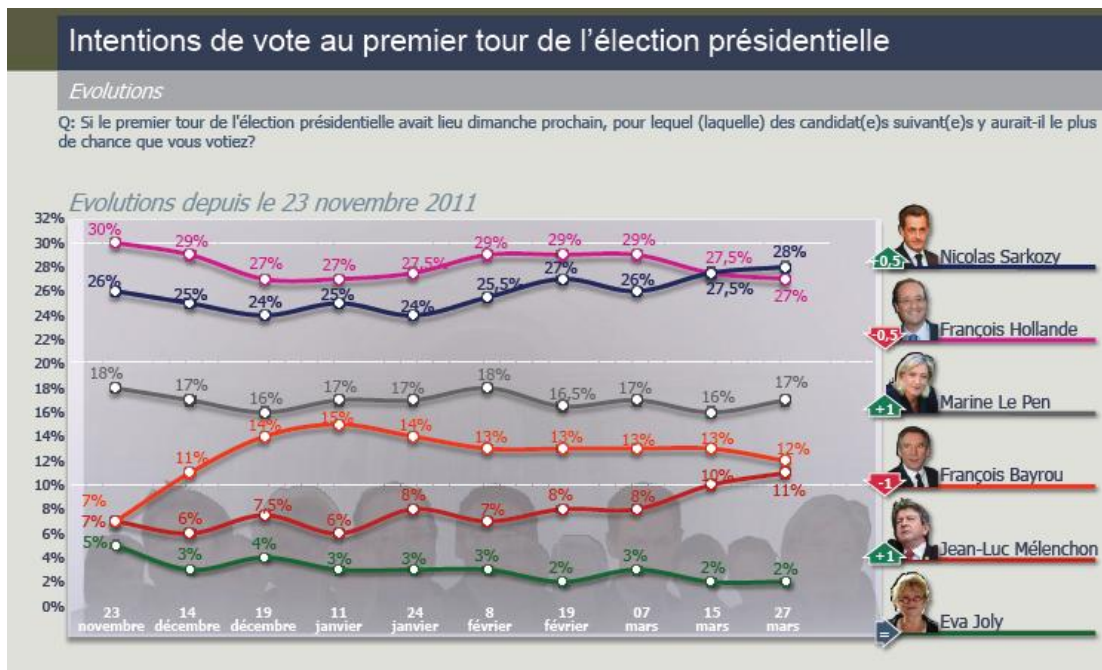
法国总统选举采取两轮选举制。所有已登记的候选人参加第一轮选举，得票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从 1962 年至今从未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当选）如果没有人得票超过 50%，则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要成为登记在册的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至少来自法国 30% 省份的 500 名民选代表的联名推荐（全国共有 45000 名民选代表）。法国选举不运作政治广告；竞选期间，媒体必须公平的覆盖和报道每一位候选人。每位候选人的竞选花费不得超过 2000 万欧元，对于得票达到 5% 的候选人，国家会返还其 20% 的竞选费用；对于其他候选人，国家会返还每人 80 万欧元竞选费用。

和美国、英国等一般意义上的两党制国家不同，法国是一个多党制国家。法国的选举类似于一个表述政治意愿的论坛，每一个政党和观点都有机会在全国层面上被表达出来。所以今年法国大选，在第一轮选举中有多达 10 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3、竞选情况

2012 年法国大选，一共有 10 位正式候选人参选。此外，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因为没能得到 500 名民选代表的签名，所以最终没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这样一个 500 名民选代表签名的制度曾遭到了法国国民阵线的诟病，国民阵线指出这一制度并不合理。当然其他支持率低的小党候选人也反对这一制度。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也曾经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建议希望取消 500 人签名的制度，但是未获得成功。

这次推出的 10 名候选人包括来自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的萨科奇，中左翼社会党的奥朗德，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中间派法国民主联盟主席贝鲁，左翼联盟（共产党）的梅郎雄，左翼的绿党候选人艾娃·若利，以及其他 4 个小党的候选人。其中前三位候选人在这次竞选中的呼声最高。



受到处于欧债危机下的法国经济不景气和对其任内改革措施的批评的影响，从去年夏天开始，总统萨科奇的民调支持率就很低，最后一年始终在低位徘徊。2012 年选举中，尽管萨科奇一直试图提升其影响力，但是最终未能成功。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了从 2011 年 11 月份至 3 月底的民调走势。其中奥朗德和萨科奇高居前两位。

排名第三位是玛丽娜·勒庞。勒庞今年第一次参加竞选，玛丽娜·勒庞有一些铁杆的支持者，其支持率基本稳定在接近 20% 的程度。贝鲁的支持率位于第四位，其处于法国的中间派，主要承袭了中间偏右翼的传统，这是源自于法国第三任总统德斯坦遗留下来的传统。贝鲁在竞选刚开始支持率上升比较快。因为竞选经费的问题受到了质疑，因此之后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左翼联盟候选人梅郎雄的支持率也一路走高。第六位是欧洲环境和绿色党的候选人，艾娃·若利，其围绕环境的话题始终没能吸引到更多的选民，她的支持率基本上在 5% 以下。

直到三月初，大部分民众还没有决定最后要支持谁，可见民众下最终决定的时间越来越晚。不过支持萨科奇的选民立场还是很坚定。从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所有人一直预期奥朗德和萨科奇进入第二轮，而随着大选的临近，两个人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政治社会学的调查发现，更多的民众认为奥朗德比萨科奇更加接近法国人所关心的议题；在对法国未来的发展计划上，二人基本处于平手；但是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更好决策，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决定的能力，谁更有国家领导人的权威这三个问题上，萨科奇的得分都超过了奥朗德。这两位候选人的脾气和个性看起来非常不同，奥朗德看起来更加亲民，而萨科奇则显得更有权威性。在问到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高犯罪率造成社会不安因素的问题上时，由于受到犹太学生枪击案发生的影响，萨科奇在这一问题上比奥朗德更受欢迎。不过在最后的一个月大部分的预测和民调都显示，奥朗德比萨科奇的得分更高，更有可能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

4、选举结果

2012年法国大选登记选民4600万左右，超过900万放弃投票，最终投票人数超过3600万。将近80%投票率也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高的投票率。第一轮投票结果如下图，萨科奇和奥朗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

候选人	得票百分比
弗朗索瓦·奥朗德（社会党）	28.63%
尼古拉·萨科奇（人民运动联盟）	27.18%
玛丽娜·勒庞（国民阵线）	17.9%
让·吕克·梅郎雄（左翼联盟）	11.1%
贝鲁（法国民主联盟）	9.13%
艾娃·若利（绿党）	2.31%
尼古拉·艾尼昂	1.79%
菲利普·普肚（法国工人斗争党）	1.15%
娜塔利·阿尔托（新反资本主义党）	0.56%
雅克·舍弥纳德（团结与进步党）	0.25%

简单分析下得票情况。社会党在 1981 和 1988 年两次都是密特朗当选总统。2002 年社会党输给了国民阵线的勒庞，成为了第三名。2007 年是罗雅尔进入第二轮，败给了萨科奇；2012 年是奥朗德最终当选。人民运动联盟是右派政党，沿袭了戴高乐——希拉克——萨科奇的脉络。2007 年萨科奇当选总统时，首轮支持率超过了 30%。

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基本上在 10%-20% 之间浮动。国民阵线在 2007 年最低时只获得了 10.4% 的支持率，今年则获得了 17.9% 的支持率。中间党派法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从德斯坦沿袭至贝鲁。贝鲁于 2007 年曾获得 18% 支持率，位居第三。这次下滑到了第五位。绿党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 2-4% 的较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联盟（共产党）的支持率。在二战后很长时间，法国共产党是左翼的第一大党。从 1970 年之后，共产党被社会党超越，成为次要左翼政党。法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其退出政府，所以其支持率也就不断下滑。随着密特朗当选，共产党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在 2007 年的时候达到了 1.6% 的历史最低点。今年大选中，梅朗雄领导的左翼联盟能达到 11% 的支持率确实出乎意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于极左势力的支持。这也证明了法国国内政治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资本主义等激进左翼倾向的稳定的支持人群。

从政治分野上来说，左翼联盟、绿党、社会党归为左翼政党，国民阵线和人民运动联盟归为右翼政党。第一轮投票中，1570 万选票投给了左翼，1690 万选票投给了右翼，330 万选票投给了中间派贝鲁。整体而言，右翼政党得到的支持更多。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欧洲国家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经典困局，即执政党派很难吸引到平民阶层的选票。在本次大选第一轮投票后，从国民阵线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上也有所体现。这次选举中，平民阶层的选民主要支持极端政党。据调查，工人中 30% 的人没有参与投票。而在投票工人中，30% 的人投票支持勒庞，使其成为得到工人选票最多的候选人。

虽然法国政治中有左翼传统，但国民阵线支持率不断升高也体现出目前法国右翼处于上升的趋势。国民阵线获得支持的地区主要是正在城市化和去工业化的地区。据统计发现，在城市中心区和乡村，勒庞的支持率很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其支持率很高。奥朗德则正好相反，在大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支持率最低，在城市和乡村支持率很高。萨科奇在这三个地方都比较稳定，变化不大。基本上，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没有明显变化，一直在 20% 以下。目前法国民众已经开始接受并习惯国民阵线这种极右翼政党在法国选举中出现，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在 5 月 6 日第二轮投票中，奥朗德获得 51.62% 的选票，萨科奇获得 48.36% 的选票，最终奥朗德获胜。第二轮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80%，相比 2007 年下降了 5%。并且投空白票人数占了全国选民 5%。这也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这说明，有 25% 的民众没有做出选择，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从第二轮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二人支持率的实际差距并不大，在第五

共和国历史上这属于中等差距。相比 2007 年第二轮总统选举，这个差距缩小了很多。不过，2012 年大选的弃权率比 2007 年增加了，其中工人、男性和青年的弃权率在上升。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男性更多的将选票投向奥朗德，而女性对于两人的投票则比较平均。在 2007 年，男性将更多的选票投给了萨科奇。实际上男性投票中，投给左派的选票比投给右派的多，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而 2007 年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的。2007 年，尽管罗雅尔是女性，但是大多数男性仍将选票投给了右派的萨科奇。

从年龄的划分来分析，65 岁以上的人投票给萨科奇的人数比较多；失业者、自由职业者、小业主投给萨科奇的票比较多。将 2007 年的罗雅尔和 2012 年的奥朗德两位社会党人做比较，奥朗德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和一部分 65 岁以上人群的选票。另外，从职业阶层看，普通的雇员和工人更多的投票给了奥朗德。

二、 2012 法国大选结果的深层原因剖析

2000 年修改宪法将总统和议会任期保持一致，本意是为了避免左右共治的混乱局面，从而加强总统的权力。而萨科奇在 2007 年高票当选，却在 2012 年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深究其中缘由，以下几点原因可供思考。

1、 萨科奇未能兑现当选时的承诺，失去民众的信任

在与现任总统竞争时，新候选人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当国内经济环境衰退的情况下，那便是对现任总统政策的不满。萨科奇在 2007 年竞选中承诺帮助法国人改善其生活环境，但实际上他所坚持的政策与许多选民所感受到的实际生活状况是相反的。2007 年的民调显示，有 55% 的民众认为其生活状况有所下降；这个数字在 2012 年上升到 64%。虽然萨科奇希望吸引更多极右选民，在竞选中做出了很多极右的承诺，但是并未如愿获得足够支持，同时也丧失了一部分中间选民，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竞选颓势。值得关注的是，在有两大党派或有两种政治倾向的党派竞争时，最重要的竞争战场便是争夺中间派。因为从民调中显示，一直坚定支持萨科奇和奥朗德的选民数量相对比较稳定。而平民阶层的选票并不明显支持极左，除了一部分公开支持极右，绝大多数是分散在各个候选人之中。“赢得中间派就赢得了选举”，这次奥朗德能赢得选举也正是因为他成功地吸引到平民和工人的选票。

2、 欧债危机下，国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引发民众对现行体制强烈不满

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欧洲整体上经济受益，但是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受益程度不一样。事实上，受过技能培训的社会上层在一体化进程中受益，而社会下层如从事技术含量低工作的工人阶层则在一体化进程中相对受害。社会严重分化，甚至有极端化趋势。在政治层面上，左和右的差异变小，慢慢被平民和精英的分野所取代。萨科奇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予大企业、银行和富人阶层特殊照顾，中下层民众可谓“怨声载道”。另外，幅度大、覆盖范围广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更是将萨科奇推到了社会抗议的风口浪尖。民调显示，

80%的法国人认为有必要改革养老金体系，但60%的人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36%的人表示支持此项改革。所以，从萨科奇政府2008年公布改革计划之日起，法国百万人抗议游行活动就未停止过。而此次大选正是民众表达抗议的另一种方式或途径。

一方面，这次选举中，极左和极右拥有令人惊讶的高支持率表现出了民众对现行体制不满，对现有政治形势的抗议，表达了民众期待变革和公平。选民明知自己支持的极左或极右候选人不可能当选但仍然投票给他们，那么他们的投票行为与其说是投票选总统，不如说是对现政府的抗议。对他们来说，总统选举更多意味着政治诉求的表达，而不是做出政治决策。

另一方面，奥朗德则恰好迎合选民“求变革”的心态。“改变，从现在开始”这种试图大力扭转现行政策的口号的确深得人心，在社会民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在竞选纲领中，奥朗德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改变承诺，似乎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经济领域，改变一味的紧缩应对政策，强调以多种方式刺激经济复苏，如振兴实体产业、设立公共投资银行、鼓励投资型企业在法设厂等；在社会领域，凸显“平民主义”理念，大力推动社会公平，尤其对年收入超过百万欧元者课以重税。另通过“巨富税”、“遗产税”等税改措施强化财富的再分配，同时注重保障并提高中下阶层的社会福利。暂且不论奥朗德接任后的政策执行力，也不论竞选纲领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政策的可操作性，其整体政策关注点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确实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法国普通民众的强烈需求和愿望。

3、萨科奇高调的行事作风和鲜明的性格特点让其在总统任期内备受争议

在第二轮投票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选民被问到“你是因为什么动机选择了这个候选人”时，选民的回答“因为他的政策吸引我”这个选项上，萨科奇和奥朗德二人得分基本相同；而在“为了防止另一个竞选人当选”这个选项中，萨科奇却明显输于奥朗德的，说明萨科奇比奥朗德更加不受选民的欢迎。

本次总统大选的两个热门候选人在性格、行事风格几乎是截然相反。萨科奇被民众称为“超级总统”、“炫富总统”，而奥朗德则被称为“平民总统”。萨科奇一贯强势、独断专行，利比亚战争虽然为法国赢得欧洲军事大国的声誉，却并未给他赢得很多支持率；迎娶模特妻子后绯闻缠身，在民间口碑变差。而奥朗德生性平和，温文尔雅，又愿意与民众接近，简单的从政经历使他几乎没有“致命缺陷”。萨科奇个性自由、随便和浪漫，若是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民众或可接受这种与以往沉闷严肃的总统形象不同的新风格。但是当国家深陷危机时，他的性格则会被反对者攻击为“飘忽不定”。而奥朗德自诩为“普通先生”，以朴实的生活反衬着过着明星般奢华生活的萨科奇，这一对比在因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苦恼的法国人看来尤为重要。

4、“政治钟摆”的再平衡效应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中，“政治钟摆”效应使得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走直线。国家每往前迈一步，要经过各方的协商和妥协，也要考虑到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只要往任何一个方

向过分地倾斜，另一方便会立即尽全力往回扳。实践这种“之”字型发展道路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而法国也不能例外。从1995年起，“人民运动联盟”连续执政长达17年之久，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带有右派色彩。历经三届任期的右派，在执政能力上已有一定的权力磨损。尤其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萨科奇仍然秉持保守理念，与德国一同推动经济紧缩政策并整肃财政纪律，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客观上也导致法国经济保持颓势，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从普遍经验来看，右派执政有利于缓解经济危机，但其偏向富人的政策主张也因损害普通民众现实利益而引发不满。当全世界都在声讨新自由主义弊端时，凯恩斯主义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政治钟摆也会随之摆动。

三、奥朗德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

这次法国大选体现了法国政治时钟的左转，法国重新开启了左翼执政的时代。奥朗德上台，如何应对欧债危机，如何带领法国进入上升通道，如何处理法欧和法中关系，都是对他的严峻考验。欧盟的前景因为法国新总统的上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关注。

1、法国大选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

从法国的政党制度来看，本次的法国选举标志着法国传统上的四党竞争的制度不复存在。欧洲极端主义政党在最近的大选中频频露面，并斩获不小的支持率。法国此次也不例外，因此这次选举可以说是法国极端党的一次胜利。极端主义政党在法国政治中呈现常态化的趋势，并且有了稳固的支持人群。法国政治中传统的观点认为中间派的力量很重要。而此次大选中极端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却在稳步的上升。伴随着欧洲政治的步伐，法国政治也开始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极端化和两极化的趋势。

尽管有媒体分析说，此次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民对于萨科奇的不欢迎态度。不过这并不是社会党上台的主要原因。法国选民还是希望在紧缩政策下能够看到政府态度的改变，民众更希望奥朗德给予社会带来更多社会公正，而不仅仅是选民对于萨科奇个人的抛弃。因此，奥朗德上台后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仍然是如何重振国内经济，维护社会公正。从这方面来看，未来奥朗德的社会变革需要在紧缩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进行相互协调，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奥朗德关于法德关系及欧盟政策的意向

奥朗德表示他将在执政中继续增加刺激计划，以扩大就业和消费并建议重塑欧盟“财政契约”，这方面与欧洲紧缩政策背道而驰。他强调，欧盟“财政契约”只强调财政纪律，缺少有关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加强科研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如果欧洲国家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足够信贷支持，欧洲经济将继续深陷衰退。奥朗德强调需要在“财政契约”中体现的建议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欧元债券），为大型工业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第二，促使欧洲投资银行加大放贷力度；第三，开征金融交易税；第四，充分利用目前尚未动用的欧盟结构基金。这表明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或趋宽松。奥朗德提出的对“财政契约”

进行重新谈判，实则是对德国一贯主张的财政纪律提出挑战，有可能与默克尔发生分歧和摩擦，给应对欧债危机的前景带来不确定因素。显然他的上任会影响法德的关系，法德在欧盟发展中的某些问题上观点对立，决定了法德关系将不会像萨科奇在任时那么紧密。不过奥朗德表示，德法两国应尽快弥合分歧，并向市场发出能够稳定欧洲形势的信号。

奥朗德承诺为了维护法国的利益，将大幅调整欧盟的未来方向，他的上任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元区受困经济体能否坚持紧缩政策。作为左翼政党，奥朗德反对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的财政紧缩措施，主张制定欧盟层面的增长战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刺激欧盟的经济增长；同时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削减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拒绝全盘接受经过各国多次艰苦谈判达成的欧盟财政协定的主张，要求欧盟就有关债务问题的协议重开谈判。这表明他要向欧盟更多表达其代表的左翼的意愿，虽然与欧盟各国分歧重重，但是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不会变化，最有可能的是在不断妥协与协商中达成共识。另外，在欧洲治理问题上，奥朗德虽然也强调法德轴心的重要性，但也注重要发挥其他国家的作用，比如说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之间的平等参与。

3、奥朗德对中法关系的意向

人权问题是法国左派的价值观底线，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的立场将始终如一：既不回避，也不根据形势来调整立场。因此，此次奥朗德当选，仍可能会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指责，是否接见达赖的问题也仍是矛盾的焦点。此外，他把中国当作法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称不接受不可兑换的人民币，并将解决中法贸易问题提升到欧洲层面。他强调不希望中国购买欧洲国债，反对中国经援欧洲，认为这会影响到法国的主权。同时，奥朗德可能会在收取航空碳排放税上有所动作，而中国曾经拒绝接受欧洲的这一做法，因此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中法、中欧之间会有更多的谈判。从上述方面看，奥朗德对华态度可能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加上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对法国的重要性，奥朗德还是十分希望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他声称不会拒绝中国产品，希望双方贸易平衡。值得关注的是，奥朗德当选后在选择自己的外交顾问时，选择了一位精通亚洲和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前驻华外交官（55岁的PAUL JEAN-ORTIZ，中文名字叫燕保罗，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足以体现其置对华关系于外交首要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奥朗德的顾问团队会给他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奥朗德当选后，首先接见的就是中国驻法大使，因此有理由相信奥朗德能够找准自己在中法关系时的立场。虽然不排除中法在一些问题会出现分歧，但与萨科奇时期中法关系的大起大落相比，未来5年中法关系将是比较平稳的。

总体来说，奥朗德的上台不会对中法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与欧盟的关系，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系会出现一些分歧。奥朗德上任也会对欧盟的前景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要取决于法国与其他欧盟国家之间的协调情况以及能否尽快达成共识。

（撰稿人：袁昊、陈丽媛、王垦）

“文化价值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2012年4月20日,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明斋315室召开了“文化价值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主持了研讨会并做了主题发言,博士研究生王亮,硕士研究生玛莎、张迪、许宛伶、师文涛、左存信,本科生韩一元在会上分别做了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和谐价值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张利华

“外交是运用智力处理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①运用智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和对外政策开展外交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领导人的信仰价值观和政治智慧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国民心理和民族认同,大多数国民的价值判断和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和各种信息渠道传达给国家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领导人的对外决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它们是: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其中起着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

和谐的意思是“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②即合理、适当、恰到好处。合理,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真理法则做事,适当就是适宜、妥当、恰如其分。和谐价值观倡导的是和而不同,不同事物的合理搭配,恰如其分地组合或融合,事物由不协调达致协调,由不匀称达致匀称,由不平衡达致平衡。在现代社会,和谐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

仁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价值观。它是由血缘亲情扩展而来的。“家和万事兴”是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至理名言。这种带有血缘亲情的仁爱价值观延伸到朋友和社会关系之中,形成了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忠诚、自强、厚德等一整套价值体系。

义是指正义和正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不仅有个人利益,还有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们应当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敌侵犯,处于危难之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挥戈上阵,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

^①《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和《牛津英语辞典》对外交的解释,参见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

<http://www.zhou-enlai.com/7/zwjx/0005.htm>。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510页。

礼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法，不肆意妄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有皇帝祭天的礼仪，有平民祭祖的礼仪，有婚丧嫁娶的礼仪，有迎宾的礼仪，日常生活中还有礼尚往来的礼仪，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别强调礼貌待人。^①

智是指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有自知之明，有智谋。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知人”，爱人就是做人要有爱心，知人就是做人要有智慧，善于识别人。^②人不仅要有爱心，同时还要善于识别好坏、善恶和是非。要有抑恶扬善的智慧和智谋。中国历史上有一批既爱人又知人的爱憎分明的杰出人物，如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将领卫青，唐太宗时期的名相魏征，北宋名相寇准，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等。

信是指讲信用，诚实守信。孔子倡导人要靠自己的劳动而合理、适宜地取得财富，不要靠坑蒙拐骗获取财富。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强调说话做事要守信用。诚实守信，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种道德品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儒商用诚实守信原则办企业，形成了百年不倒“老字号”的企业。

忠强调国民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这是由血缘亲情演化而来的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就像自己的家庭遭受破坏一样，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还包括君子要对自己的家庭忠诚，对朋友忠诚。

孝也是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尊老、敬老、养老、送老”是儿女的天职。“老有所养，少有所依”是最基本的家庭美德。

中国传统和谐价值价值观在新中国外交领域有明显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和而不同

和谐思想认为，宇宙存在着多样性的统一。差异不等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演化成矛盾，有时候则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自然和社会有许多因差异而紧密合作的例子。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是新事物生成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指的是君子有不同的观点，不盲目附和别人，却能和谐共处。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和谐思想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体现。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2002年12月24日前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发表的演讲就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③

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

^①孔子：《论语》，第168页。

^②孔子：《论语》，第138页。

^③熊月之主编：《和谐社会论》，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样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① 200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概念。^②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很重要的对外政策。当一个国家内政出问题，其他国家插手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趁机煽风点火，支一派打一派，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道义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干涉内政，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干涉内政很反感，很不赞同。

2. 大国尊重小国

老子的《道德经》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交汇于此。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大国应当以谦和取得小国的依赖，小国应当以谦下取得大国的合作。大国不要有统治小国的过分欲望，小国不要过分地去奉承大国。大国小国都各自达到自己的愿望，大国特别应该谦下。”^③

老子还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千溪百川之首领，是因为它总是处于最低下的位置。……正由于不与人争，因而天下的人都无法与之相争。人类惟有从相争相残转变为和衷共济，共存共荣，人类社会才有希望。”^④

这种观点运用到中国对外战略上，就会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强国不要欺负小国弱国。大国不要以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更不应该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标准的国家加以蔑视、打击甚至消灭。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各国都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存共赢。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问题发表讲话，表示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⑤中方一向反对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更不赞成扩大这种制裁，施压、制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加剧对抗，也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加强对话合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问题。^⑥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投资贸易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穷国的态度。由于中国近代遭受过许多外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借款的附加条件，有过切肤之痛。所以，中国对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贷款的做法十分反感，也很不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处理邻国关系上，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富邻、善邻”的外交方针，中国政府大力推

^①吕鸿、何洪泽：《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1日第3版。

^②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中国新闻网2009年09月24日。

^③老子：《道德经》，徐澍、刘浩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169页。

^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新华网，2012年1月26日。

^⑥“外交部就联大弃权票、中国军舰公海训练等答问”，外交部网站，2011年11月23日。

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扮演着协调人的身份，在协调朝美矛盾、缓解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本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发展的，1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开展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的思想。

3. 高处不胜寒

和谐价值观强调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反对走极端。《易经》乾卦有一个警句说：“亢龙有悔”，^①意思是说，龙飞到极高的地方会因空气稀薄寒冷窒息摔下来而后悔，说明极端的状态不能持久。老子的《道德经》曰：“物壮则老。”意思是说，过分的强壮的东西就容易趋于衰老。^②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大国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登峰造极的状态。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跃起大步想要快走，反而行走不快。自我显扬的反而不能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不能昭彰；自我夸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作众人之长。”^③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日益强大时，不要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更不要刻意追求世界老大。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美国，善于平衡协调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美国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

4. 合理地斗争

和谐价值观，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尽量用协商、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但是，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如外国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坚决进行自卫反击，用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侵害，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运用政治智慧和各种手段进行斗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提供了对敌斗争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孔子的儒学，还有对敌斗争的《兵法》。譬如，在南海问题上，面对挑衅中国主权海岛的菲律宾，中国政府尽量以外交手段，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主权、领海和岛屿，在需要的时候，也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5. 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和谐价值观倡导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平与合作，共存共赢。这些思想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2009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提出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④

^①徐澍、张新旭译注：《易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②老子《道德经》，徐澍、刘浩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③老子：《道德经》，徐澍、刘浩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9页。

^④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中国新闻网2009年09月24日。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这种提法在国际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都存在，让每一种文明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焕发生机。它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新思路。

文化价值观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左存信

一直以来，欧盟十分重视文化的保护和推广，并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重要性。然而，在对外关系领域，欧盟仅笼统的强调要在对外决策中考虑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因素，并未对其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进行系统性的论述。

2007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A European Agenda for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该份文件提出了欧洲文化模式的概念，强调文化在欧盟对外关系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并提出加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扶植文化创意产业、使文化价值观在欧盟对外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等三项目标。欧盟认为，欧洲文化能如此灿烂并成为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为强势的文化之一，是欧洲各国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成果。正因为各国的文化存在差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过程中激荡出伟大的欧洲文化。为了确保欧洲文化在今后长期保有优势，欧盟强调要尊重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欧洲文化更加蓬勃的发展。为了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欧盟希望通过文化间对话的方式，增进民众对成员国之间不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从而达到文化多样性中的一致性。欧盟认为，上述方式不仅可以促进欧盟成员国和民众的文化认同，还能提高成员国及其人民对欧盟一体化的认同，使欧盟在多元中更加团结和紧密。

在对外关系中，欧盟主张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展开对话，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欧盟通过为这些国家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和相关优惠政策，协助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在欧盟境内推广其文化。在对外援助方面，由于帮助第三国开展现代化建设经常会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古迹、文物等文化遗产造成破坏，故欧盟在对外援助时特别强调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保护，通过兴建博物馆和保护地方文化产业等方式在现代化和文化发展之间取得平衡。通过上述方式，欧盟希望在国际间塑造出欧盟尊重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形象，同时以文化这种较为柔性的媒介同世界各国及其人民进行接触和往来，在过程中增进他们对欧盟的好感，使其在非强迫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接受欧盟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此外，欧盟亦通过积极参与与文化相关的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在文化价值观领域的影响力来提高自身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由于欧盟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但鉴于无法在政治和军事等“硬实力”领域和美国匹敌,因此通过利用自身在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领域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盟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加强对盟内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达到文化多样性中的一致性,从而提高成员国对一体化的认同以及欧盟民众对欧盟的认同,使欧盟以更为团结和紧密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一方面通过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展开对话,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文化在欧盟对外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建立欧盟尊重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形象,在过程中建立同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联系,将欧盟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灌输到世界各国,以此方式提高欧盟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对外政策

王亮

在欧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规范性力量的欧洲”。这一内容与欧洲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密切,并且深刻的影响着包括欧中关系在内的欧盟对外政策。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直到二战,欧洲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文明中心的位置。这样优越的地位加上基督教的一些特殊性,欧洲产生了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欧洲中心论”。到二战结束时,欧洲不但失去了世界文明的中心位置,而且必须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并分别控制了欧洲一部分的事实。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使得欧洲重拾信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提出欧洲在世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类问题,最初是“民事力量”。八十年代面临美苏两国新的冷战,有学者提出了欧共体所起的民事作用非常有限,建设“军事力量欧洲”远比民事力量欧洲要重要的多。

冷战结束之后,“民事力量欧洲”和“军事力量欧洲”都受到了质疑,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恩·曼纳斯的“规范性力量欧洲”思想。其核心思想在于:以往的思想包括共同的基本假设,即民族国家、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在冷战后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欧盟成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之外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如果还是把欧盟类比为一个国家,那么将是非常不合适的。认为“规范性力量欧洲的概念与‘施加于舆论的力量’、‘观念力量’或‘意识形态的力量’相关”,欧洲正在以规范来设立世界标准,这方面甚至连美国也望尘莫及。

具体的说,欧盟的规范基础建立在自欧洲一体化发端以来它不断积累起来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之上,可以归纳为五个核心规范: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以及四个小的次级规范: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

从这些价值观本身来看,体现了欧洲人潜意识中的道德优势和规范意识,以欧洲为道德榜样,强调欧洲式价值观的转移和扩散,并且在对外政策中借助文化渗透的手段,体现在欧盟的对外政策中,就是近年来表现突出的“规制主义”倾向。

一、欧盟对华人权外交

自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欧盟（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议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搞集体反华议案同时，也进行双边人权法治对话。在人权问题上，坚持认为欧洲标准的普适性，要求中国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但是由于中国的严正立场，以及欧盟内部的意见不统一（部分成员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华人权外交收效不大。

二、中欧经贸关系

欧盟在与中国近年来的经贸摩擦中，多次采取规制主义立场。例如 2004 年欧盟出台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所有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 2011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注册，否则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也许这一法令出台本身是为了规范欧盟的药物市场，但是由于注册门槛太高。（《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传统草药“在申请日之前至少要有 30 年的药用历史，其中包括在欧盟地区至少 15 年的使用历史”，而国内绝大多数以非药品身份在欧洲销售的中药产品难以提供在欧洲有效的销售证明。）在截止日期到来之际竟然没有一家企业成功通过注册，直到今年也只有少数企业通过了注册。关于化学品方面 2007 年的 REACH 法案也是如此，具有典型的技术贸易壁垒的特征。

其他问题例如碳排放等，欧盟也有规范性的表现。总的来说，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毕竟不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对于美国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行为也有所牵制。欧洲文明的先进方面也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欧洲标准毕竟不能等同于普世标准，当今社会不能再继续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谐发展，才能使中欧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中英文化价值观差异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

张迪、师文涛

中英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中英两国在文化价值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了两国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采取了不同态度和不同举措。

中英文化价值观差异在外交政策上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对如何走向和谐世界的道路看法不尽相同。

英国对外政策深深植根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推崇其个人自由、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就文化价值观而言，英国普遍认为只要个体的自由得到满足，就能够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也就是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和主张。因而在中东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示威后，英国上下，自政府到普通民众，对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国内的反对派都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无论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已验证过，没有国家主权的保护，人民的个体权利难以存续。因此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体观念，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一直都在强调国家作为基本实体的主权属性，强调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与英国所坚持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因此，在国内问题上，中国反对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以“个人”身份会见达赖喇嘛，也反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内政指手画脚；在中东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比英国更为谨慎的决策和态度，在尊重各国的主权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坚持反对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希望通过政治谈判的和平途径来解决伊朗问题，因为对伊朗国家主权的干涉，势必对伊朗人民带来伤害。

除了深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英国还是一个宗教影响深远的国家。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对人们思想和生活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而且新的社会问题又使得英国民众更需要传统价值观的安慰。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对今天的英国而言，已经不仅是心灵的慰藉，而是已成为与国家、公共利益有着重要关系的一种信仰。英美文化浓厚的宗教情结在外交政策上突出表现为传教士情结。与美国一样，将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推广到全世界是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自苏联解体以来，“华盛顿共识”下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表现在外交政策上面，就是为推动所谓的“自由民主”，不惜采取各种方式，包括战争，英国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而英国所推广这条道路的方式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未考虑到其他欠发达国家各自面临的特殊国情。这尤其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对外政策大为不同。

中国文化价值观虽强调天下大同，但却是“和而不同”，强调社会多元化基础上的和谐，表现在国际社会，就是主张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在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价值观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国情，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模式，被外国人概括为“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的要义其实就是没有共同的模式，各国都应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除此之外，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强政府，弱社会”。这种社会力量对比状态最早形成于秦代，秦汉的大一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思想家的兴盛和社会力量的发展。郡县制和科举制的建立最终加固了这一格局，明清两代的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力量终被压制到几乎湮灭的状态。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政府占强势地位主导社会发展顺理成章，中国也更加习惯这种国家治理模式。

所以，一方面是英国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指指点点，另一方面是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走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道路表示理解和赞赏。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为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敲响了警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个寻找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形式下仍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与英国文化价值观差异导致的不同对外政策的效果高下已见分晓。

法国文化价值观的根源

许宛伶

文化价值观在外交决策与政策决定的过程当中，对于判断国家利益起到了选择作用，不仅是因为文化构成了一种集体的价值判断倾向，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家领导人与外交人员的谈判行为。Edward T. Hall 提出文化对谈判行为的影响，他把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以及低语境文化，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谈判的行为模式也有所不同。高语境文化重视关系的建立，沟通与表达常是含蓄迂回的，多出现在种族多元性低、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常见于东方文化，如中国与日本，西方国家比如法国，也属于高语境文化。在高语境文化中，谈判与协商倾向关注群体和谐与共识，多于个人的功成名就与私利。低语境文化的谈判协商是实用主义的，按部就班地依循着程序、规则，沟通表达讲求切中要点，比起关系的建立更加在意协商的结果，这类的文化包含美国与德国。Edward T. Hall 提出的这种“二分法”无法全面了解文化在一国外交行为中的影响。尽管法国与中国同属高语境文化，两者仍有所不同。亨利·基辛格曾提到，要理解法国的外交行为，必须了解法国的文化与历史，不可忽视的关键历史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另外一位专家 Cogan 强调笛卡尔的逻辑思维传统对于法国文化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革命激进主义的传统以及对人权维护的普世原则，形成了哪里有人权压迫就哪里揭竿起义的倾向；革命的传统使近代的法国缺少渐进温和的改革，多次的政治体制变革就是例证，而当前法国社会常见的街头激进抗争与群众罢工等也同样是一种性格的体现。激进主义也表现在与宗教的冲突，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天主教教会对社会阶层的控制，严格主张宗教与政治、社会领域的分离。法国社会的宗教冲突延续至今日，表现在对境内穆斯林族群的特殊立法，另一种观点解释法国的价值观与穆斯林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则是建立在人的共性与人权的基础上。法国大革命似乎也带给法兰西民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以“人权祖国”而自豪。

法兰西民族继承了笛卡尔的演绎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决策或谈判当中，大目标与框架的确立优先于细节的罗列。当对外谈判时，法国人的逻辑论据一旦确立，并主张逻辑思维的不懈可击时，法国人是不会轻易妥协与让步的。

通过考察法国的历史文化与启蒙背景，了解法国文化价值观的根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法国的对外政策和交往行为。

中德文化差异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韩一元

目前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日趋频繁。在经济方面，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教育方面，中国在德国的各类留学人员约 3 万人，400 多所中国高校和德国近百所高校建立了校际联系。2010 年的“德中同行”活动更是把中德间的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不论是政府职员、国际商务人士、移民还是留学生，都需要了解对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掌握相应的沟通技能，以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一、窥斑观豹：中国与德国文化差异

很多中国人在德国，感觉很难和德国人交朋友，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去处理，缺乏“集体”感，彼此之间缺乏对话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淡”等。比如有些中国学生说：“每次都很想和德国同学下课后聊聊天，他们好像很忙，放学后就都不见了。”“我和一个德国朋友认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到现在他都没有请过我去家里吃饭。”“我们是一起踢球的队友，球场上是好哥们，离开球场后‘关系’感觉很疏远。”

对于此问题，德国心理学家 Thomas (2003) 和华裔语言学者 Liang (2003) 进行过探讨和总结，德国人的行事特点主要体现在公私分开，就事论事，自立，准时，生活和工作中偏向结构和规则。而相反，中国人则比较讲求人际关系、等级观念、面子和社会和谐，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是规则相对主义。“关系”在中国人心目的位置非常重要，中国人常以关系的好坏来进行朋友的选择和划分。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和德国文化在人际关系层面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二、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

默克尔执政后，一直强调在对外关系中“必须不遗余力地确保价值观在外交中的地位”。2007 年 10 月，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结成的议会党团通过“亚洲战略文件”，对“价值观外交”作了初步阐述。2007 年 12 月，基民盟出台新党纲，着重强调“价值观外交”对于德国应对新世纪挑战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观外交”的理念。默克尔“价值观外交”即成为德国执政党对外政策纲领，其核心是意识形态挂帅，以此对其他国家定亲疏。其主旨是将外交政策作为推进西方价值观

的工具和手段，让德国外交为建立西化世界的目标服务，使德国在西化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默克尔断言，在施罗德甚至科尔执政时期，德国对中国采用了偏重经济利益考虑的实用主义政策，这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却是以中国政府“漠视人权”为代价的。她主张，对华政策的中心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合作，而应是人权、能源、环境、知识产权等多个目标并重。她认为，鉴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地位因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空前提高，它不再只是充满诱惑力的市场，而是德国与欧洲国家在原材料和能源领域日益强劲的竞争对手；默克尔强调，如果不断强大的中国继续在民主道路上没有进展，很不利于亚洲乃至全球的民主进程，对西方的民主体制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德国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在对华外交中必须增加基本价值观因素，即在民主、人权领域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促使中国改善人权、推行良政，逐渐使中国走西化道路，最终将其纳入西方民主国家体系。

俄罗斯与中国文化价值观异同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

玛莎

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俄国学者霍夫斯泰德和他的思想继承者把中国文化描述为定向集体主义和强调建立和谐的关系。从小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中国人非常注重社会分层结构和层次关系，并且中国文化主要是由孔子学说组成的。中国人非常珍惜稳定的关系，如果你给别人添加麻烦或伤害他们的话，中国人会感到非常愤怒和耻辱。

儒家价值观使中国人把长期稳定的关系看成个人关系最重要的特点。他们尽量试图不给别人带来负面情绪和消极感情。人际间密切关系的发展被看成和谐、理解和支持的发展，它们可以被称为“信贷”，是一个人给别人的信贷，如果将来需要的话，他可以还这个信贷。跟这点有关的是“面子”的概念，或者是拿到或保护“面子”的概念。“面子”对中国人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子”像钱可以获得、失去或给予。两个人相互失去“面子”会导致消极情感的表现。

许多中国专家所认同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包括：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

和谐指的是合理、妥当、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事物之间的搭配恰到好处。

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谐就是讲平衡、讲协调。平衡不是平均，协调不是折衷调和。平衡和协调都是恰到好处和恰如其分。和谐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

2006年韩国专家布莱恩金、阿特金森等进行了价值观的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体现为亚洲国家（被调查者为韩国人和中国人，于是结果主要代表了这两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拥有14个核心价值观。有儒家哲学，注重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价值观，和气，服从社会，注重团队合作、对成就渴望等内容。这14个价值观分别为：

1. 各自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
2. 维护自己家庭的名誉
3. 集体主义
4. 对家庭和社会规范与期望的顺从性
5. 对有影响力的人的敬意
6. 对学习和工作成就的倾向
7. 对父母表示服从
8. 家庭的优先地位
9. 维护人际关系和谐
10. 把别人的需求看成比自己的需求更重要
11. 互惠原则
12. 尊重长辈和自己的前辈
13. 自我控制
14. 谦虚地介绍自己的成就。

二、俄罗斯的核心价值观

全世界著名的价值观问题专家沙洛姆·施瓦茨认为，俄罗斯人最主要的价值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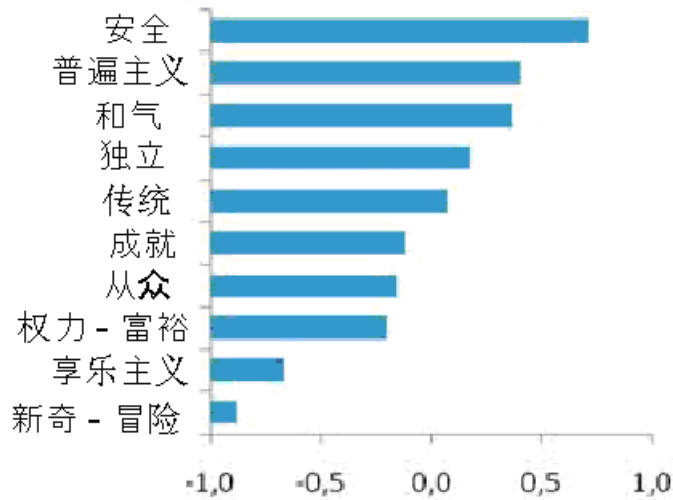
图1 施瓦茨对俄罗斯价值观的看法

No	价值观名	水平
1	权力	高
2	安全	高
3	遵从性	高

4	传统	高
5	成就	中型
6	刺激	中型
7	善良	中型
8	普遍主义	低
9	独立	低
10	享乐主义	低

用他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俄罗斯科学家马公和路德涅夫分别总结出的一些价值观是：

俄罗斯



N=2395

普通的俄罗斯人需要强政府的保护，他们和西方人相比，态度更谨慎并且有恐惧心理，更少地需要新奇、创造和独立，对他们来说，冒险、享乐和享受不太重要。

应当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国家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放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这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产生，并且增加了个人对自己和家庭福利和幸福的责任感。

俄罗斯心理学家芳杜罗娃通过仔细研究俄罗斯各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得到了俄罗斯人的以下价值观：

精神价值大于物质价值、集体主义、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也就是不仅认同俄罗斯文化价值观，而且认同异国文化价值观）、传统意识。

克利耶夫斯基等学者指出，在俄罗斯人认同的价值观中，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共同利益看成比自己的个人利益更重要。俄罗斯人更重视直觉分析，他们不是把福利、权力和声誉当成最重要的价值观，而是把良心和真理当作最重要的价值观。

彼得罗夫研究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发现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人非常重视家庭观念。

三、俄罗斯和中国文化价值观比较

俄罗斯和中国价值观有很多相同的内涵：

集体主义；

注重家庭；

普遍主义；

和气；

传统；

对有影响力的人敬意；

安全；

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价值观不太注重新奇、创造、独立、冒险、享乐和享受的倾向。

随着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的扩大，中国和俄罗斯价值观都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独立的特征。

俄罗斯和中国价值观的不同点：

俄罗斯不太注重和谐价值观；

俄罗斯不像中国人那么注重家庭（没有那么强烈的维护自己家庭的名誉，对家庭和社会规范的高度期望，对父母表示服从和家庭的优先地位）；

俄罗斯人更注重正义，中国人则更注重和谐。

四、俄罗斯与中国核心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

下面探讨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在许多的国际政治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是相似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相近立场的原因之一是中俄价值观的相似性。

例如在利比亚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有相同的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西方国家提出进入利比亚的决议时，两国都选择了弃权。俄罗斯在利比亚没有太大的利益，俄罗斯与利比亚都是石油的出口国，2008年俄罗斯冲销了利比亚所欠45亿美元的债务。作为交换，俄罗斯公司赢得了利比亚金额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而中国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却非常大，因为利比亚拥有世界3%的石油资源，并且是石油的出口国。

对俄罗斯来说叙利亚有很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拥有最后一个国外海军基地，叙利亚跟俄罗斯进行的军事和商业交易的价值数十亿美元，而且叙利亚邀请俄罗斯参加阿拉伯-以色列的和平谈判。

中国在叙利亚有商业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允许在自己的国家里蔓延“阿拉伯之春”的“细菌”，主张维持稳定，避免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

2002-2009年叙利亚与俄罗斯签署的军事合同价值为58亿美元，叙利亚与中国签署的军事合同仅为800万美元。在2006-2009年叙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比前四年期间增加了三倍。

与西方的不断施压相比，俄罗斯不断发表声明，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以及西方国家要求巴沙尔下台的立场。中国也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呼吁在阿盟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

俄罗斯和中国在对待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的问题上都强调和平解决的立场。两个国家都不参与任何战争或侵略任何国家的政策。这表示它们在维护和平正义，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等方面有共同的价值观。

“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

2012年5月25日，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明斋315室召开了“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硕士研究生玛莎、师文涛、博士研究生王亮、硕士研究生左存信分别就中国对俄罗斯的文化外交、改革孔子学院的建议、欧盟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特点及应对措施、欧盟文化外交文件《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的主要观点做了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中国对俄罗斯的文化外交

玛莎

从许多中国政治学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出这样结论：中国希望能改变当代全球化的内容。他们不同意全球化等于西方化，而认为全球化应该作为各个国家文化的融合和对话。于是当前中国在世界各个国家积极推广自己的文化，试图让各个民族都能够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习惯、传统和思维方式等领域。中国在俄罗斯也开展了相关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这里对此加以总结。

一、中国对俄罗斯的文化外交

1. 孔子学院

中国在俄罗斯目前开办 20 个孔子学院，其中在莫斯科 3 个，在圣彼得堡 2 个，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各 2 个。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教育项目之一，此项目由中国教育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于 2004 年启动。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6 年 3 月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新华网做客中俄“国家年”官方网站时透露，从 2006 年开始要在俄罗斯建立若干个孔子学院。周济指出，2005 年 11 月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支持在两国开展汉语和俄语教学的协议，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政府也对汉语教学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俄罗斯孔子学院的建设得到了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截至 2007 年 5 月 15 日，共有 7 所俄罗斯高校与国家汉办签署了互办孔子学院的协议。

2. 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年”和“汉语年”

中俄双边关系的综合稳定与否取决于两国的人民是否互相了解和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中俄两国开展了一系列国家级的活动。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2006 年在中国和 2007 年在俄罗斯分别举行了“俄罗斯年”和“中国年”，2009 年是在中国的俄语年，2010 年是在俄罗斯的汉语年。互办的“国家年”包含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科学技术、教育、军事、地区等双边合作的方方面面，活动的实质意义之丰富，涵盖领域之广，民众参与程度之高，社会反响之强烈，都创下了中俄交往史的新纪录。2013 年将成为俄罗斯在中国的旅游年。

二、俄罗斯民调机构关于中国的调查

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CIOM）自 2005 年开始进行关于中国的调查。每一次发放 1600 份问卷。接受调查的地区包括 153 个定居点，46 个俄罗斯地区、共和国和州。统计误差不超过 3.4%。所以研究可靠性非常高。

该调查列出了俄罗斯人目前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位置。分析该中心关于中国进行的调查，可以让我们了解目前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以及中国文化外交在俄罗斯的效果。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从 2005 年起开始关于中国进行调查。作者用关键词“中国”来选择关于中国的调查。

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在过去的 10 年里对中国的看法变好了（约 25%）或者没有变化（约 42%）。只有约 10%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坏了。

2005 年被调查时，回答“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状全局？”的问题时，34%的俄罗斯人认为两国关系非常好，只有 5%的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友好。这说明俄罗斯人大多把中国看成交好的国家。也可以看出 2007 和 2009 年的调查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

全俄民意研究中心从 2005 到 2009 年四次调查了俄罗斯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什么定位。四年间俄罗斯人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变化。约 21%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及盟友，更多人（约 38%）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这也是中俄两国政府的共同愿望）。约 22%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经济竞争对手。

下面的结果表明从 2001 年到 2009 年每次调查时 50%多的人把中国看成 21 世纪的盟友和紧密伙伴。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的看法从 17%（2001）减少到 11%（2009）。

下面分析的是调查有关中国在其他国家中的位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例如 2007 年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该国最友好的国家（21%选了中国）。2006 年和 2010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占第三或第四位，这是非常高的位置。而 2005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伙伴（32.62%人这么认为），2007 年有 21%的人这样认为，这少于日本（26%）。

总之，从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友好的国家。约 34%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睦邻友好的国家，而只有约 5%的人认为中俄是敌对关系。经三年调查的结果表示约 59%的人把中国看成交好的国家及经济伙伴。约 22%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经济对手，而且只有约 5%的人把中国视为不友好的国家。经四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50%的人把中国看成是 21 世纪的盟友重要合作伙伴，而只有 13%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仇敌邻国”。从中可明显的显示出大部分俄罗斯人把中国看成睦邻友好国家和经济伙伴。

中国也是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经济中重要的盟友与伙伴。2007年的时候，俄罗斯人把中国作为本国最友好的国家，约27%的人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伙伴。从中可看出普通的俄罗斯百姓也把中国看成俄罗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只有一少部分人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有威胁，并把中国看成不友好的国家。这还意味着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眼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友好并可靠的合作伙伴，形象比较好。

不过最近还有些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表示俄罗斯人其他的对中国看法的特点。这个调查的四个部分都是在2011年6月5日举行的。进行调查时，提出的问题分别有：1) 您想在什么国家居住？2) 您想去什么国家工作？3) 您想去什么国家学习？4) 您想去什么国家旅游？

调查结果显示，希望能去中国居住的人为零，也就是说没有人想移民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一生。而有13%的人希望移民到德国，10%的人想在美国居住。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是比较多俄罗斯人想移民的国家。

想去中国工作的人也非常少，只有1%。同时有15%的人想去德国和美国工作，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是俄罗斯人最愿意去工作的几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是俄罗斯人最想去工作的目的地。

想去中国学习的人也只有1%，而俄罗斯人最想去学习的国家为英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15%，11%和8%。

这个调查最后的部分表示想去中国旅游的人已经有4%。在俄罗斯人想去旅游的国家中大约占据中间的位置。最多的人想去法国（20%），意大利，（19%），德国和土耳其（12%）和埃及（11%）。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俄罗斯人把中国看成对本国非常友好的国家，而且是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伙伴，但是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等领域还不太了解。很少有人想去中国学习和工作并没有人想在中国定居。作者认为其原因有：首先俄罗斯文化传统跟欧洲接近。俄罗斯人更容易理解并接受欧洲文化。欧洲显得“简单”，“容易理解”，“熟悉”。

其次，欧洲的国家生活水平非常高，很多俄罗斯人之所以想去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欧洲国家的生活非常好。还有目前在俄罗斯经营的80%的媒体都是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这导致俄罗斯人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并把它们看成“世界中心”。而中国刚开始崛起，还没有欧洲那么发达。人一般不会很快就改变自己对某个国家的概念。俄罗斯人很可能就是因为害怕在中国生活水平低，而不太愿意去该国家生活、工作和学习。不过有相当于多的人（4%）愿意去中国旅游。这表明俄罗斯人愿意多多了解中国，希望能够看看现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肯定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外交在俄的成就。

再次，作者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很多不太容易理解的传统、习俗、利益，也就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对于不认识它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它，需要专门研究和学习。而在现代的世界每个人每天都会受到非常多的消息。对每个人来说理解新的东西的基础是它的简单性和跟自己的向同性。虽然俄罗斯前身的苏联和现代的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而组成的。儒家文化对俄罗斯人不太熟悉，所以比较难消化和接受它。而比如美国的文化可以说是“通俗文化”，对各个国家的人容易理解并接受。没有任何礼仪和传统等等。拿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理可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中国文化有很多部分只用超我才能掌握的（超我一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难理解，不符合人本能的部分，而它的很多部分跟快乐原则有关。对世界所有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消化并引用。

于是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外交已经在俄罗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是多数俄罗斯人还是对中国缺乏了解。为了让俄罗斯人更容易的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需要加深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中国应该在俄罗斯进行更多的活动，而且需要找中国文化跟俄国文化相似的部分推广到俄罗斯，并且尽量简化一些传统、礼仪、道德准则。这会让俄罗斯人更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

关于改革孔子学院的几点建议

师文涛

一、“孔子学院事件”

根据美国国务院 5 月 17 日发布的公告，目前在持有 J-1 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将不得不于 6 月 30 日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交流项目签证。据此，有 50 多名孔子学院教师要在今年 6 月本学年结束时，回到中国重新申请签证。

国家汉办和包括美国高校在内的孔子学院各方均对此事高度关注，并与美国政府展开沟通。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 25 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要求部分教师重新申请签证的指令并不是针对孔子学院，而是想确保外国学者和教师领取正确的签证。纽兰承认美国国务院 17 号发布的公告草率，并对此表达了歉意。当天美国国务院也重新发布了修改后的公告，表明孔子学院符合美国资格认证，在小学或中学任教的访问学者无需在 6 月 30 日前离境。

令人费解的是，美国官方要求对孔子学院进行所谓的“认证”。公告声称：“目前，国务院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美方称，基于初步审查结果，“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些学院已获得美国的认证”；而之所以需要美国认证，是为了确保教育符合并保持相关既定标准。

孔子学院本身不计学分，不授学位。换言之，孔子学院不具认证的前提；而美国官方迄今也从未说明孔子学院应该向谁认证。横向比较一下，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在美文化交流机构都毋须得到美国认证。

因此，有分析称，美方这一决定的背后有政治原因，认为这是美国试图破坏中国近几年最成功的文化外交、阻挠中国输出软实力。

二、孔子学院的经营方式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一样，孔子学院都是政府资助的传播本国语言 and 文化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都可以归纳为三点：教授本民族语言，传播本民族文化，提升国家形象。

但是另一方面，从编制的角度来看，孔子学院是由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事业单位，事业级单位。这一特点注定了中国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非常浓重，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和歌德学院相比，除了对政府经费的高度依赖这一共同点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孔子学院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中国官方的意志。

孔子学院经营模式分类比较：

(一) 汉办项目型。这类孔子学院是指主要依靠从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申请到的经费开展活动的孔子学院。此类孔子学院虽然也有面向市场的经营活动，但在学院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微不足道。这类孔子学院主要靠总部“输血”维持生命。在已开始运行的孔子学院中，这类型的占大多数。据初步统计，在 2007 年底以前已开始运行的 125 所孔子学院中，约占已开始运行的孔子学院所的 62%。

(二) 产业经营型。产业经营型孔子学院有明确的市场经营理念，其教学项目和文化推广活动大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其教学项目一般为收费项目，文化推广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项目也实行交费参与。2007 年，有 48 所孔子学院明确报告了收费情况或至少提及收费，约占已开始运行孔子学院的 38%。

(三) 基金捐助型。基金捐助型孔子学院是指除汉办项目经费和日常经营收入之外，孔子学院还成功申请到基金会的基金或募集到捐赠用于推动学院发展的一类孔子学院。但这一类型数量极为稀少。

三、英法德文化交流组织的经验

在欧洲主要国家,民间组织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最为典型。

法国 1883 年成立致力于在海外进行法语教学的法语联盟。法语联盟是一个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一所致力于传播法国语言的优秀学校。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旨在传播法语及法国文化,目前全球有 1100 多个机构分布于 130 个国家和地区。

德国 1951 年建立歌德学院,目的是促进国外的德语语言教学并从事国际文化合作,现已遍布 78 个国家和地区,分支多达 144 个。

英国 1934 年在民间组织世界人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当时的文化协会,后来为文化委员会。是英国负责教育和文化关系的国际组织,通过遍布全球的 230 家分支机构和 109 家教学中心开展教育,英语教学、艺术、科技、法治与管理与信息等项目。

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并没有包揽民间组织已经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而是采取不同的体制,给予它们的工作以更有力的支持。无论法国、德国和英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经费都来自政府,以保证其财政资源的稳定性,这是它们能够持续在海外展开工作的最有力保障。

尽管官方色彩不可避免,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法语联盟、歌德学院,还是英国文化协会,仍然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它们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国家在海外的文化交流工作大部分仍然是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政府甚至并不直接出面。法国、德国和英国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非政府组织都非常注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例如法语联盟在所有国家始终保持非政府色彩,都是根据当地法律建立起来的非盈利性机构,拥有一个志愿工作的理事会,由所在国公民担任主席,理事会的工作不取报酬,不介入当地的政治、宗教和种族争议等,并且所有的法语中心都根据具体情况坚持采用不同的形式介绍法国文化,并致力于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当然前提是他们制定的办学章程须得到法国法语联盟的认可。北京歌德学院在其网站上也声称对于所有积极从事和德国、德语以及德国文化相关工作的人们而言,独立负责自己的工作,不带有政治意味。其工作目的是通过对话合作建立长期的互相信任理解,以便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合作。英国文化协会在其所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具有主导权,政府只限于监督并给予它财政资助,英国这一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自主性是最高的。

四、改革孔子学院经营方式的建议

这次“孔子学院事件”的发生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但是也表明孔子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应该加以改进与完善。8 年来,中国政府在孔子学院这个项目上投资超过五亿美元,与英法德三国相类似,中国政府并不是单纯为了推广汉语,其背后有进行文化外交、推广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输出软实力的国家战略目标。为了更加有效和良性地实现这一目标,笔者提出对孔子学院现有模式进行改革的建议。

1、坚持以汉语教学为主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自身语言的国家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本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当今时代，美国文化之所以有着统治性的世界影响力，除了其自身的超强软实力，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作用无疑是前提性的。从这一点来说，对于美国文化霸主地位英国出力不少。类似的例子是法国文化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法语在非洲的广泛运用功不可没。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汉语的作用。因此，孔子学院的重心仍应该放在推广汉语上。只有汉语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和其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才能真正加大。这一点可参照英语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美国文化在中国的普及。

2、减弱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

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与政府机构保持距离能有效避免因政府过度干预文化外交而被其他国家误读为文化侵略。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在西方主流价值观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有着强烈的输出意识形态的意愿，为了减少这种顾虑，必须减弱孔子学院浓重的官方色彩。

与前文提到的欧洲三国的文化外交机构相比较，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非常浓重。虽然同样是依赖官方的经费，但是欧洲三国的三个机构都是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而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国家事业单位，教育部国家汉办即是孔子学院总部，完全不是社会教育机构。参照欧洲三国的成功经验，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顾虑，减弱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将其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教育机构势在必行。

3、冲出高校，走向民间

美国圣母大学凯洛格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东亚语言与文化学副教授莱昂内尔·詹森在即将出版的《新闻标题内外的中国》一书中，对孔子学院提出了批评。詹森说，他对孔子学院的担心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孔子学院与其他推广本国语言与文化的机构不同的是，它设在高等院校内。他说：“这本身就令人震惊。”

这对孔子学院的改革是一个参考。首先，将绝大部分孔子学院设立在大学校园之内，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功利性过强，可能反而不利于发挥影响力，还会招致美国教育界一些传统主义者的反对。比如，2010年，芝加哥大学的174名员工签署联名信，反对在未经教职员评议会允许的情况下设立孔子学院。另外，就语言学习而言，兴趣是主要的因素。因此，希望孔子学院能更加的走向民间，走入社区，吸引更多的低龄人学习汉语，激发下一代外国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现在中国80后对美国文化的喜爱、90对日韩文化的追捧，都是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培养起来的。参考这一点，孔子学院应该更加深入民间，把眼光放长远，同时必须更加有耐心。

欧盟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特点及应对措施

王亮

文化外交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一个外交领域，所谓“文化外交”，指的是在国家整体的外交战略目标指导下，以文化为载体和主要手段，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对象（可以是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所采取的国际公关活动。其所处的领域介于外交和文化之间，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

欧盟的文化外交相对于其他领域起步较晚，直到2007年5月10日欧盟委员会才首次发表了关于文化的战略文件，即《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议程》（*A European agenda for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这份文件基本上涵盖了欧盟对外关系中包括理念、目标和工具在内的文化维度。结合欧盟近些年来的对中国文化外交的实际情况，可以总结出欧盟对中国文化外交的一些特点：

第一，欧盟文化外交理念上贯穿着“规制性力量”的考虑，目的在于推动欧盟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的时代，欧盟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坚持“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文化与发展”等政治正确的正当性话语。对内塑造欧洲认同，对外对抗美国的文化霸权。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的《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欧盟坚持反对把文化产品和服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则自由流通。

第二，欧盟对中国文化外交在其对外文化外交整体战略中尚不占有突出地位，目前欧盟的对外文化外交全局中，优先考虑的是中东欧地区（包括曾经的候选国即现在的新成员国）、地中海等周边地区、非加太地区、俄罗斯等。对华文化外交主要集中在亚欧会议中的文化领域对话和对精英开展工作施加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欧关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话题相对突出些，并且存在相应的争议点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在于双方对于对方的双向误解，造成了文化上交流较少。

第三，欧盟的公共外交较多的采用“对话”的形式，不赞成搞“宣传”。杰弗里·柯安和阿梅里·阿森诺尔特将公共外交分为三个层次：独白、对话与合作。与其他两种形式相比，欧盟在对华文化外交中较多的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即不同国家的公民一起参与一项计划或达成一个共同目标。结合欧盟对华文化外交多采取对精英做工作的特点，欧盟在此方面采取了资助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欧洲研究的办法，如对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项目的资助。此外，欧盟驻华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峰威力在近期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中，特别提到：开展公共外交应避免宣传，为了达到好的说服效果，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就要讲真话。

总结以上欧盟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特点,可以提出中国相应的应对措施:第一,加强对欧盟的文化外交,使得中欧之间文化外交呈双向发展趋势。第二,加强对欧盟的研究,分析欧盟主要机构之间、成员国与欧盟之间、成员国之间对华文化外交态度的差异,注意其中哪些是中国对欧文化外交需要注意的情况。第三,既要看到欧盟主张文化多样性有抵制美国文化霸权的于我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欧盟坚持“欧洲文化模式”于我不利的一面。例如欧盟在提出文化多样性时总是与人权问题互补,包括保护土著居民、少数族裔以及社会边缘人群等。这样才能理解欧盟主要机构(尤其是欧洲议会)多次在西藏问题上给中欧关系制造麻烦的原因。

《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概述

左存信

2007年5月10日,欧盟发表了《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文件,现将此文件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欧盟不仅是一连串经济程序的集合或一个强大的贸易行为体,更应该被视为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共同体。文化是实现欧盟繁荣、团结、安全等战略目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欧盟必须渴望成为一个基于人类尊严、团结、宽容、言论自由、尊重多样性、跨文化对话等价值观的软实力典范。因此,欧盟在促进欧洲与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基于文化的重要性,该文件主要探索文化和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的关系,并提出欧盟文化行动议程的目标。

根据欧盟条约第151条的规定,欧盟在文化领域的权力主要由成员国政府掌握,欧盟中央只能在尊重成员国自主权利的情况下从旁提供相关的协助,从而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增进民众对成员国之间不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欧洲文化能如此灿烂并成为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为强势的文化之一,是欧洲各国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成果。正因为各国的文化存在差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过程中激荡出伟大的欧洲文化。为了确保欧洲文化在今后长期保有优势,欧盟强调要尊重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欧洲文化更加蓬勃的发展。为了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欧盟希望通过文化间对话的方式,增进民众对成员国之间不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从而达到文化多样性中的一致性。欧盟认为,上述方式不仅可以促进欧盟成员国和民众的文化认同,还能提高成员国及其人民对欧盟一体化的认同,使欧盟在多元中更加团结和紧密。欧盟2007至2013年的文化计划将致力于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激发文化的创造力,并充实成员国的文化内涵。该计划为数千个文化组织的创建和及其文化艺术项目的实施提供帮助,从而加强欧洲文化遗产的传播,促进跨文化对话,艺术和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并希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成员国对欧盟的认同。

欧盟在对外文化政策中的角色：

1. 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流通，博物馆的创建和恢复。
2. 通过资金赞助来支持电影和视听等文化产业。
3. 将更多的力量集中在支持人权，包括保护和促进文化权利，维护少数群体、土著居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
4. 展开与地中海文化之间的对话，并建立与欧盟成员国以外的第三国的政治对话以及在文化上的辩论。

欧盟文化行动议程的目标：

1. 推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
2. 在里斯本战略框架下，发掘文化作为创意产业催化剂的作用。
3. 促使文化在欧盟的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欧盟成员国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上述目标，并同其他成员国合作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专业组织、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与基金会等文化领域的相关利益者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以及同欧盟机构的对话，并支持欧盟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和行动。欧盟委员会应该充分利用其内部和对外政策，扮演协调欧盟机构、成员国和相关利益者的角色。